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夏衍传

陈坚 张艳梅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世纪行吟

# 世纪行吟

## 夏衍传

李锐 张艳梅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行吟：夏衍传 / 陈坚，张艳梅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7-213-03088-4

I . 世 … II . ①陈 … ②张 … III . 夏衍 (1900 ~ 1995) - 传记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841 号

### 世纪行吟——夏衍传

陈 坚 张艳梅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 - 851765  
责任编辑 李育智  
责任校对 叶 宇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1.8 万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088-4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

万 蟹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𫖮、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 目 录

第一章	仁和之子	(1)
第二章	东渡扶桑	(18)
第三章	激情“左翼”(一)	(39)
第四章	激情“左翼”(二)	(93)
第五章	流亡岁月	(118)
第六章	重庆鏖战	(149)
第七章	迎接共和国	(181)
第八章	转折期的迷惑	(198)
第九章	浩劫与复出	(236)
综 论	时代之子 文化巨匠	(261)
夏衍笔名集录		(274)
夏衍大事年表		(276)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4)

# 第一章

## 仁和之子

公元 1900 年 10 月 30 日(农历九月初八),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 号)沈家,一个男婴降生了。这是沈家的第八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夭折),其时父亲沈学诗已年过不惑,他为这个“老来子”取名乃熙,字端轩,这就是日后在现代中国的戏剧、电影和新闻领域都成绩斐然的夏衍。<sup>①</sup> 夏衍出生之时,正是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那一年八国联军一路攻入北京城,给现代中国史重重地抹上了一个耻辱的印记,更令诸多有识之士对清政府彻底绝望。就在这耻辱和绝望中,一股新的、革命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它将引导着中国进入一个别样的天地。历史在那样一个灾难之年行进到了它关键的转折点,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未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刚刚降临人世的夏衍自不待言,不过生于如此艰难时世,却注定了他与时代、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命运。

关于夏衍的出生地,据其孙女沈芸介绍应为浙江仁和县<sup>②</sup>,

---

① 本书以下全部以夏衍称呼,因为夏衍一生所用笔名甚多,必要处将给予交代。

② 沈芸 1990 年 9 月 16 日代夏衍致陈坚信。

仁和，旧县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改名钱江县，在宋、明、清三代都是杭州的发展中心，辛亥革命后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夏衍有一枚收藏章，上面所刻便为“仁和沈氏曾藏”。此印章为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1976 年去世前的绝作，原设计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请他将“珍”字改为“曾”<sup>①</sup>，并解释说此字意味那些珍品只“曾”在他的画柜里收藏过，但不会永远归他所有，总有一天会捐献给国家的。

沈家祖籍河南，宋室南渡时移居江南，“经南宋、元、明、清王朝，至清朝末期，已成为相当富裕的中产地主阶级”<sup>②</sup>，并兼有中层官吏的身份，在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影响的大户人家。沈家在仁和广置田产，还出资在严家弄西面修建了一个寺庙，名为“月塘寺”。但经太平天国战争后，沈家迅速衰败：城内骆驼桥的房产被焚毁，严家弄的房子则一度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属作为指挥所征用，夏衍祖父沈文远也在混乱中被太平军俘去，因其知书识字而成为陈玉成的记室（秘书）。太平天国失败后，陈玉成派了一个“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到杭州，归乡后的沈文远不久也曾考中过举人，但未曾为官。沈文远娶妻余杭章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堂妹。沈文远生有三子三女<sup>③</sup>，长子沈学诗，次子及一个女儿夭折，所以童年夏衍的记忆中只有大姑母、二姑母和四叔父。大姑母嫁樊家，住在杭州斗富三桥；二姑母嫁李家，安徽人氏。樊、李两家都为官宦人家，夏衍回忆大概是道台、学台或是抚台一类的官员。夏衍 12 岁时，大姑母过世，但樊家仍与

① 江潜：《夏公献画记》，《钱江晚报》1989 年 12 月 8 日。

② 夏衍：《我的家史》，尚未发表，原件存于传主家属处。

③ 夏衍《我的家史》中回忆说祖母生有“二子三女”，但又说次子和一个女儿夭折，因为他还有一位四叔父，故而应该是共三子三女。

沈家相往来；二姑母死于安徽，姑丈续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女子，但这位女子对沈家一直颇多照顾，直到夏衍赴日留学，沈、李两家仍交往不绝。四叔父在苏州衙门做事，家境并不宽裕。至于祖母的娘家章氏一族，在夏衍童年时已无直接来往，不过逢婚丧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礼仪而已。

沈学诗，字雅言（用杭州话来读即为“夏衍”），是一个迂阔而比较恬淡的人，秀才出身，曾去应试而未中举，从此放弃功名，在家中读书自娱。他的书柜中摆满了各类书籍，除经史子集外，还有《七侠五义》、《天雨花》、《再生缘》等杂书，这些杂书顺理成章地成为夏衍的幼年读物，也为他将来走向文学之路铺就了第一块基石。沈学诗对医道颇多了解，且收集了许多民间验方，但并未正式行医，只在乡间为熟悉的乡亲治病。也有人请他去坐馆（即当私塾的教师），他婉谢不就，如此坐吃山空，家境没落之势更甚。夏衍不足4岁时，父亲沈学诗于除夕之夜突然中风身亡，终年仅48岁。和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一样，夏衍也遭受到了幼年丧亲之痛。

沈学诗过世后，家庭的重担便压到了夏衍母亲徐绣笙的肩上。

徐绣笙是德清人氏，夏衍称她为“性格奇特的人”，当然并非指其性格有何怪异之处，而是对其非同一般的坚强表示惊讶。徐绣笙不信佛，也不敬奉耶稣，她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支撑着七口之家，以直面现实的态度为儿女们提供精神动力，夏衍宽厚而坚忍的个性的形成，与母亲的影响密不可分。徐绣笙是养蚕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批“头蚕”和“二蚕”，此外她还种菜、种豆，饲养鸡、鸭以贴补家用。尽管她苦苦支撑，终难维持一家的生计，长子乃雍早已去德清做了学徒，不得已又将三女儿琴轩送给苏州的四叔父抚养，同时仍然还需接受亲戚的周济方可维持。常给予周

济的便是夏衍的大姑母和二姑母及母舅徐家，而所谓周济，也不过是送一些衣物或借十元、五元的现金，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沈家的困境，却也可解其燃眉之急。徐绣笙识字不多，但熟知许多掌故和三国、水浒等故事，尤其酷爱戏剧，不论京剧、绍兴大班，她都一定要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夏衍对童年时母亲带他和四姐到杭州城站的戏院看京戏的经历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这或许便是他与舞台的最初结缘吧。

除去母亲徐绣笙，二姐云轩也对年幼的夏衍疼爱有加，姐弟深情一直维系到晚年；倒是大哥沈乃雍（字霞轩）对夏衍不甚爱护，也许是年龄相差过大（他长夏衍18岁），或许是长子身份使他过早地承受了生活的压力而磨损了对弟弟的温情，总之，在乃雍那里夏衍未曾领受到多少手足之亲。这于夏衍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或许是自幼生活在女性关爱中的缘故，夏衍气质中多了几分温婉、阴柔，由人至文，其戏剧、其散文都不乏此特点。

当时的严家弄是一个小村子，除了街头两端的两座寺庙有时还显得热闹外，街上并无店铺，甚至连一家豆腐坊也没有。严家弄一带的居民多是手工织绸的工人和种菜的农民，因而夏衍结交了许多农家伙伴。严家弄向东四五里，便是奔腾的钱塘江。滔滔江流，配以青山秀水，加上河塘、山野中一群朴素无华的农家伢儿，构成了夏衍的童年世界。

作为母亲最疼爱的幼子，夏衍的教育得到了徐绣笙极大的关注，但其少年求学之路可谓“一波三折”。7岁时他先入村中的私塾念《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一年多后因大姑母的干预而转入杭州城里正式的学堂“正蒙小学”，课程除去旧学外又新加了算术、修身、体操等。正蒙小学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一年多，因姑母的夫家与夏衍家境相距悬殊，一方面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闲话，一方面担心与阔绰的表兄弟相处令孩子产生自卑心理，

徐绣笙断然决定让夏衍退学，回到家里以一本《幼学琼林》作为自学读物。年事渐长的夏衍开始学着帮助母亲做农活，采桑、养蚕、种蔬菜，还养了几口猪，尤其养蚕的经历对夏衍影响至深，为其后来改编茅盾的《春蚕》提供了鲜活的切身体验。同时他的心灵世界也在日渐丰富。那时沈家虽已破落，仍居住着一座大宅子，即先前兴盛时下乡祭祖的临时公馆——“八咏堂”，那是五开间七进深的大院，除天井花坛外，宅后还有一座花园，空房尘封，狐狸不时出游，它们与祖坟墓地上几人方可合抱的大香樟树共同组成了一副残败、幽暗的图景。后来长兄乃雍在这座宅子开办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机器织杭纺，浙江丝绸业凋落之后，机子也便停止了转动。对于衰败的故园，夏衍一直怀有一种类似契诃夫“樱桃园”的情感，1939年他还拟就了一个三幕剧的提纲试图将此感受展现于舞台，终因故未能如愿，但在散文《旧家的火葬》中这一遗憾得以补偿：“那一年，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或橘子树砍掉，他们之间曾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但是结果是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sup>①</sup> 在“文革”中被“监护”时期，夏衍仍常常梦到他出生的这座旧屋，不仅房子结构和陈设，连某一块地板已经朽折，某一处墙壁已经剥落，甚至幼年在后院的一棵橘子树上捉金龟子的情景也历历在目，可见其故园情深。抗战时期，“八咏堂”被日伪征用，并在那里开办了“正大茧厂”，后被游击队烧毁，“八咏堂”就此不复存在。

与“八咏堂”的幽索和衰败相映衬的是时代大潮的涌起。

<sup>①</sup> 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1909年,浙江杭嘉铁路通车,杭嘉铁路是浙江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等策划建造的沪杭铁路的一段。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铁路之传入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交通方式的一大改善,更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吸纳、接受,是“实业救国”思潮中的一个典型事件。随着铁路线的延伸,中国公民的视野被引向了广阔的现代世界,它带给国人的震撼是强烈的,对此夏衍在其自传《懒寻旧梦录》中描述道:“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姐、四姐和我,背了长条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不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了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记忆犹新。”幼小的夏衍对铁路除了新鲜、好玩外,不可能有其他更深刻的领悟,但铁路的确正和其他力量一道,承载着杭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朝向现代社会迈进,夏衍个人的成长也被裹挟入这一潮流中。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夏衍和母亲正暂住于德清舅父家中,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呼应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件,这便是夏衍的“剪辫风波”。其实夏衍的剪辫,多半是出于表兄的怂恿和激将,是少年人的一时冲动之举,谈不上什么自觉性、意义之类,却为我们理解夏衍的个性提供了一个例证。母亲称夏衍为“洞里猫”,大概指其拘谨、内向,但其内核却也相当果敢、刚烈。莽撞之举引来慈母的暴怒,舅舅痛责了儿子,夏衍也被禁闭在家,闭门思过。此后夏衍便在舅父的安排下进了德清县高等小学读书。

夏衍的舅父徐士骏,也是一个不第秀才,中年经营商业,是德清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开有酱园,并在一家当铺拥有股本,与

胡、俞、蔡四姓并称为德清的“四大家族”。德清是浙西北的文风鼎盛之地，常开风气之先，1901年许炳堃和蔡焕文便在德清城关镇内创办了一家用新法教授的“务本学塾”，1904年在当地士绅蔡焕文、程森、施涵、徐士骏的呈请下，“务本学塾”正式改为官立小学堂，这一学堂后来演变为现在的德清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夏衍的入德清县高小就读，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之点，正是在这里，夏衍不仅得以进一步接受正规教育，而且得遇他的第一位恩师曹绪庄先生。曹先生是德清高小的校长兼国文教师，为人严肃，但对聪慧好读的夏衍青睐有加，其后夏衍能够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也与曹先生的大力推介有关，并且曾给予夏衍以相当的经济资助。德清高小左侧有一座“明伦堂”，是当地祭孔的地方，凡德清出生考中科举的人，在这里都有一块匾额，写有状元及第或某某人在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曹先生经常带学生来这里参观，以资鼓励。在德清高小就读期间，夏衍的住食由舅舅供应，学费则由两个姐姐分担（夏衍大姐嫁给母舅的长子徐梦兰，四姐嫁母舅第五子），生活依然是清苦的。并且少年离家的孩童内心也难免凄凄惶惶，此时养猫便成为夏衍的一大寄托，终其一生，只要有可能，夏衍都与猫时时相伴，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14年夏季，夏衍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德清高小的学业，也结束了寄居母舅家的三年多生活，重新回到杭州，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亲人的团聚解决不了经济的困顿和对个人前途、国家命运的茫然感。是时国际风云变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国也正在经受着新的动荡和磨难：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日本乘机提出了意在吞灭中国的“二十一条”……那时的夏衍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已经不再是不谙世事、懵懂无知的小儿子了，他从老师、同学、表兄弟等处陆续了解到“明治维新”、“戊戌

“变法”等事件，开始关注欧战以及中国的情势。但这些毕竟与尚未成年的夏衍有一些距离，更为切近的仍然是生计问题。暑去冬来，半年的时间悠悠而过，在数个寒夜的思考后，年仅15岁的夏衍决定进城去找工作。那时由于欧战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浙江又是丝绸之府，丝纺染织业较为兴旺。不久，夏衍便在太平桥附近的泰兴染坊找到了做学徒的活计，虽然没有薪水，但总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也算是一个存身之所吧。母亲徐绣笙默默地接受了夏衍的决定，却又独自在黑夜里黯然神伤，为一代书香门第在自己手中的完结而伤感不已。此时年轻的夏衍早已跨越了伤感，怀着一种新鲜感投入到新生活中去了。

泰兴染坊包括老板、账房在内共14个人，分为练、染两部。夏衍凭其忠厚勤恳而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加之他受过正式的教育，老板和账房更是另眼相看。但夏衍并未就此感到些许轻松，相反地，他看到了更多的苦难与愁闷。当时染坊尚无机器，全靠工人手工操作，十分辛苦。工人的手因为长期与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都结成了一块大趼，再加上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出现了许多像蜂窝似的孔点。这些挥之不去的孔点一再显现于夏衍的脑际，所以五年后已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他旧地重访，对泰兴染坊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详尽调查并写成《泰兴染坊的调查》一文，阐发自己对民间染织业的见解。在泰兴染坊，夏衍安分守己地做着学徒，期望做到“满师”便可领到微薄的薪水以奉养老母，而不敢奢望其他。就在此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

1915年，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被晋格为公立学校，省内每个县都有选送两名公费学生的机会，学费由各县政府支付。夏衍在德清高小时品学兼优，加之母舅徐家的影响，夏衍便被幸运地选为德清县的一名保送生。短短半年多的学徒生涯结束了，夏

衍向泰兴染坊的工友们告别,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板也为这个孩子的幸运而兴奋,他甚至包了四角小洋的红包给他这个学徒作为贺礼。可见读书对当时人仍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读书人也因此而受到格外的礼遇。泰兴染坊的生活是夏衍真正走向社会的起点,在这里他不仅了解到下层人的众生态,更对中国的工业、经济等社会状况有了初步的印象,是其人生的一大积累。

1915年9月,夏衍入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活。

“甲工”最早创办于1911年,其前身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设有机械、纺织两科,学习期限为三年,辛亥革命期间学校一度因经费断绝而停课,1912年恢复课业,改名为浙江公立中等学校,1913年再次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增设了染色、化学等专科,学习期限延至四年,另外还设有一年预科。“甲工”的创办人为许炳望,德清人氏,亦是夏衍就读的德清高小创始人之一。许炳望是清末最早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曾任学务公所专门委员兼劝业公所科长,一次在验收设于原铜元局的劝工场时,发现那里贮存着铜元20余万,并且房屋、动力、金工、铸工、锻工各工场俱全,于是呈请开办工业学堂。当时的浙江省是全国工业发展较快的几个省份之一,民族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的起步,带动了省内民族资产阶级与外来入侵势力抗争的信念,加以濒临上海这个大都会,使浙江时常得以率先领略时代风气。许炳望笃信实业救国,对工业教育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甲工”不独成为浙江省实业救国思想的发源地,更是实业人才的输送地。

“甲工”坐落于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今大学路),学校四周环境清幽、古朴,有一面还与旧城墙相连,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办学之处。“甲工”设有教师和学生宿舍以及学校工厂以备学生实